

贾春增 主编

蔡清生 副主编



民族社会学概论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C912.5
26

95959

D126/25

民族社会学概论

贾春增 主编
蔡清生 副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 184 号

责任编辑：邱 立

封面设计：吕莉娜

责任印制：陈立彬

11

民族社会学概论

贾春增 主编

※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

邮政编码：100081 电话：847281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中国伊协大厂月华胶印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2.375 印张 314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1—3000 册

ISBN—81001—992—9/C. 60

定价：15.50 元

前 言

十多年前，就有人提出建立和发展民族社会学这门学科，不过当时条件还不成熟，因为社会学和民族学中断了几十年刚刚恢复，大家都忙于这两门学科的重建工作，而且人才短缺，研究力量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社会学不可能提上日程。

这本《民族社会学概论》，是笔者几年来在中央民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工作，与民族学系、民族理论研究所和民族经济研究所各位专家合作与共同努力的结果。

1992年，笔者由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来到中央民族大学，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工作。在此期间，有幸经常与民族学系的专家、同仁们接触和研讨，受益匪浅，进而产生和形成了编写一本民族社会学的计划。这一计划得到老一辈学者、我国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先生、陈永龄先生、宋蜀华先生和王辅仁先生等专家的鼓励，得到参加本书写作的各位作者的认同，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民族社会学是贯通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也和民族语言学、民族人口学、民族地理学等学科一样，就其学科性质而言，是广义民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从它的历史由来和现代的发展可以得到说明。

民族社会学最先是由民族学家提出来的一门学科，不过最初

不叫民族社会学，而称作“民族志社会学”。随着民族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后来才有民族社会学这个名称。1992年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民族社会学》译著，就是由前苏联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学工作者集体撰写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明这门学科的性质。

然而这并不是说，社会学家不能进入民族社会学研究领域，而是说，民族学工作者进入这一领域作研究，比社会学工作者更具有方便的条件，如了解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和民族地区的风土人情等。所有这些，对于接近调查对象、开展民族社会学研究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对于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来说，也必须是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上述条件之后，掌握了一定的民族学知识，或者与民族学家一道，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学术群体时，才可能顺利地开展工作。因此，我在这里特别要感谢与我合作的各位专家、同仁，正是由于得益于他们的帮助，笔者才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进入民族社会学这一领域，并主持和完成本书的写作任务。

《民族社会学概论》一书，共计十章，从内容来讲，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关于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即本书的第一章和第二章；第二部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区域分布，即本书的第三章；第三部分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方面的内容，也就是本书的第四章；接下去，书的第四部分内容是：结合我国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研究分析民族社会学所涉及的一些具体内容，从民族传统文化、民族心理特征到人口素质和基础教育，从社会结构、社会变迁到民族地区的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等各个方面。

读者不难看出，本书所涉及的主要是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情况，或许叫作《中国民族社会学》更为确切，但是为了突出“民族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性质，我们采用了《民族社会学概

论》这个名称。关于这一点，我想大家是可以理解的。如果将来条件允许的话，也还可以考虑再写一本续集，侧重于世界其他国家民族社会学方面的情况。

本书主编提出的这一写作框架得到全体作者的赞同，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工作进展顺利，合作得很愉快，主编最后统审和修改了全书并定稿。蔡清生副主编统改了书稿。

参加本书各章编写的作者是：第一章：贾春增；第二章：林春、龚帆；第三章：青觉；第四章：金炳镐；第五章：杨玉；第六章：孙玉兰；第七章：滕星；第八章：姚显志；第九章：上官文慧；第十章：李竹青。

借本书出版之际，也向各位读者致意。本书由于成书仓促，又限于作者的水平，书中不当之处乃至错误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修正。

贾春增

1996年6月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章 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1)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1)
第二节 民族社会学的由来与发展	(13)
第三节 民族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和特点	(24)
第四节 民族社会学面临的形势和任务	(31)
第二章 民族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42)
第一节 民族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42)
第二节 民族社会学调查研究的具体方法	(49)
第三节 调查材料的整理与分析	(58)
第三章 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区域分布	(69)
第一节 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	(69)
第二节 社会主义革命与中华民族的新生	(83)
第三节 中华民族的区域分布状况	(95)
第四章 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108)
第一节 民族问题与社会发展.....	(108)
第二节 当前的中国民族问题及其特点.....	(124)
第三节 中国的民族理论、政策与实践.....	(147)
第五章 民族传统文化与价值观	(168)
第一节 传统文化与非主流价值观.....	(168)
第二节 习俗、道德、宗教与社会控制.....	(183)
第三节 弘扬民族文化与移风易俗.....	(196)

第六章 我国少数民族心理特征	(206)
第一节 民族心理特征的含义.....	(206)
第二节 我国少数民族的社会化问题.....	(220)
第三节 我国少数民族的性格特点.....	(235)
第七章 民族地区人口素质与基础教育	(246)
第一节 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与人才投资战略.....	(246)
第二节 中国少数民族西部八省区人口构成 与文化素质.....	(249)
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 人才需求.....	(262)
第四节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基础教育现状与 发展战略.....	(267)
第八章 我国民族地区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	(275)
第一节 民族地区的政治结构.....	(275)
第二节 民族地区的经济结构.....	(284)
第三节 民族地区的阶级结构.....	(294)
第四节 民族地区的社会变迁.....	(301)
第九章 改革开放与我国民族地区社会发展	(308)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民族地区经济状况.....	(308)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民族地区的变化.....	(323)
第三节 市场经济与民族地区的全面发展.....	(335)
第十章 我国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350)
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	(350)
第二节 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利条件和 制约因素.....	(362)
第三节 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376)

第一章 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

任何一门学科，无论对于一个资深的研究者，还是对于刚刚涉足该领域的初探者，都必须明了它的研究对象，即工作领域，否则就无从进入角色，作深入的研究。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先要讨论这个问题。

民族社会学在我国是研究较少的一门学科，或更确切地讲，目前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这种状况与解放后社会学在我国的历史遭遇有关，因此，在没有转入正式讨论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民族社会学的任务之前，有必要对于我国社会学的这段历史以及学科的现状作一要简要的历史回顾。

第一节 历史的回顾与思考

今天我们许多人对于民族社会学的提法感到生疏，不少人还是第一次听到，也有人认为它是民族学的别称。这种状况表明，大家对于这门学科还不了解，而在不了解的背后，反映的正是目前这门学科还不发达的这个事实。对于象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民族社会学是至关重要的一门学科，而如此重要的一门学科，在解放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其原因何在？本节试图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学

大家知道，社会学在我国已有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早在上一世纪末、本世纪初，社会学作为西方资产阶级先进思想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由欧洲传到了我国。1903年，严复翻译出版的《群学肄言》一书，是英国早期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名著——《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 1887)一书最早的中译本。由于“社会学”一词在当时汉语词汇中尚未通用，所以严复使用“群学”这个名称表述社会学这个概念，直到后来社会学一词才逐步普及开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采用。

严复《群学肄言》一书的出版，通常被认为是我国社会学的开端。不过社会学这个舶来品，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传播面很窄，只局限于知识界很小的圈子里。从作为一门学科来看，主要是在教会学校里讲授，如燕京、清华、辅仁等这样一些大学，并大都由美国或欧洲传教士执教。

从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在欧美留学的中国留学生，陆续学成回国。部分人留在原派出的教会学校工作，有的来到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讲授社会学，或着手筹办社会学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注意联系中国的社会实际，开展社会调查研究活动。可以认为，由此开始了中国社会学本土化的历程。

他们当中有的人深入到农村，有的人深入到城市，有的人下到民族地区，深入到社会的最基层，进行社会调查。其中不少佳作就是在此过程中写出来的，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李景汉先生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等。这些著作，对了解当时中国农村和城市，对了解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资料。这些作品已成为我国社会学的经典，同时也是世界社会学文献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在欧美社会学界广为流传，颇有影响。

经过中国社会学家们的不懈努力，到40年代末，在二十余所大学里设立了社会学系或社会学专业，开出的课程有四、五十门之多，在校的学生超过五、六百人。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社会学在

这个时期里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也可以说是解放前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无疑，也是我国社会学发展史上重要的一页。不过，也不要误以为社会学在解放前受到官方重视和青睐，比如，国民党政府就不允许在大学里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二、解放后中国社会学的曲折经历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949年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我国解放以后，经过三年的恢复，从1953年起，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同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了适应这一革命性的历史变革，作为上层建筑领域的思想文化教育事业，也需要作相应的调整。1952年前后我国高等院校进行的文科科系的调整，就是适应这场革命形势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步骤。

在这次院校文科科系调整中，原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的社会学系被停办。在这些学校工作的社会学专家学者，一部分人调到中央劳动干校，一部分人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另外一部分人调到中央民族学院，即更名后的现在中央民族大学。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学者有潘光旦先生、费孝通先生、林耀华先生、陈永龄先生、宋蜀华先生和沈家驹先生，稍后来民院的有吴泽霖先生，再后，50年代初期到中央民族学院来工作的还有吴文藻先生。在此之前，他是国民党政府派驻日本使馆的文化官员。吴文藻先生和谢冰心女士弃暗投明，毅然回到祖国大陆，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报效人民。李景汉、陈达、袁方等人被分到中央劳动干校。吴景超、赵承信等社会学家首批来到中国人民大学，稍后李景汉先生也从中央劳动干校转到中国人民大学。陈达先生和袁方先生一直留在中央劳动干校，即易名后的现在北京经济学院。雷洁琼先生到北京政法干校工作，即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

应当说，当时进行这项工作，在对这批学者专家的工作安

排上，注意考虑了他们原来的教学和研究方向。从人尽其才或从统战工作的角度，对其中在社会上比较活跃、又比较有名望的学者，如费孝通先生，还委以重任，担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对调到中央民院来的其他学者也根据他们的志愿进行了妥善安置，学校成立了专门研究部和相关民族研究室，使学者们能够继续从事自己感兴趣的民族学和民族问题的研究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对于学有专长的李景汉先生，考虑到解放前他所做的大量社会调查并卓有建树，还专门成立了直属校部的社会调查研究室，由他担任室主任，领导社会调查研究工作。吴景超先生和赵承信先生也分别安排在当时的计统系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和统计教研室，与他们原来从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方向大体一致。当然，完全从事原来的专业教学和研究工作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学专业已被停办。

调到中央民族学院来的专家，完全从事民族学学科教学也是已经不可能，因为民族学专业也被停办。不过，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这批学者，并没有失去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研究的机会，因为从50年代初期开始的民族识别活动，使他们有机会深入到广阔的民族地区开展调查活动。这可谓有失有得，失去了学校的小课堂，得到了进入民族地区研究的社会大课堂。民族识别活动，为我国民族学工作者提供了深入了解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机会与实践，为日后开展民族学教学和民族研究工作积累了宝贵的资料。

但无论怎样讲，停办乃至最后完全取消社会学和民族学这两门学科是大家所不希望的。当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了整体的利益或全局的考虑，暂时牺牲局部的情况也是有的。也就是说，为了使当时的文化教育事业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好一批重点学科和专业是无可非议的。不过问题在于，作这种抉择的时候，应当从实际出发，选准对象，应

当从有利于学科建设和发展长远目标着眼才是全面的。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人多、经济落后、社会问题复杂的多民族国家里，社会学这门学科是非常重要的，不可以随便取消。民族学也是一样，也不可以随意砍去。因为这两门学科在开展社会调查和进行民族问题研究方面是其他学科难以替代的，对于我国制定重大方针政策能够提供咨询和建议，发挥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取消如此重要的学科，确实令人痛心，使许多长期从事社会学工作和民族学研究的人感到不可理解。

应当指出，在 50 年代初期取消社会学的时候，并没有对它进行公开点名或批判。当然在理论界内部对于社会学已有定论，那就是认定它是一门资产阶级学科。由于这个时候，没有公开对社会学进行批判，所以，一些学者对于恢复社会学还抱有一线希望，因为他们始终认为社会学是一门有益于社会的学科，可以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可是到了 1957 年“反右”开始以后，已经很明显，社会学恢复已经是不可能，因为对社会学已经进行公开批判，并被定为资产阶级“伪科学”和反动学科，作为一门学科被戴上了这样的政治帽子，可想而知，要想再恢复它谈何容易。人们还亲眼看到，那些要为社会学说几句话的人也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至此，通向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路已被堵死，社会学成为无人再敢问津的禁区。

几十年的时间转眼过去了，现在冷静下来回顾这段历史，耐人寻味。当时人们对于社会学的认识如此片面，对于社会学的批判也有失公允。在批判者手中的一个主要理由和论据是：社会学不是出于马克思之口，而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最先提出来的。其次，苏联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资产阶级“伪科学”，是一门反动的学科，并进行过批判。加上 57 年那种特定的政治形势和思想认识上的偏激，社会学被打入了冷宫，是完全合乎逻辑和可以预料的事情。民族学作为社会学的

近邻和姊妹学科，自然也受到了株连。不过，民族学的处境要比社会学好一些，因为没有被公开点名和批判。

谁曾想到 57 年“反右”过后不到十年又来了一场“文化大革命”，在“四人帮”横行的十年浩劫中，社会学的旧帐重提，又被折腾得不亦乐乎。这批学者中相当多的人为搞社会学吃尽了苦头，倍受冤枉。所有这一切，使后人对于这门学科已是望而却步，有谁还敢再搞社会学。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社会学作为贯通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一门边缘学科，自然不可能被提上发展日程，这或许就是为什么民族社会学在解放后如此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发展的原因吧。

三、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

1978 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自从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以来，我国在内政外交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内实行改革，首先是在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接着在城市开始了经济改革试点，举国上下一片生机。在对外方面，大开国门，引进外资，实行开放。在思想政治领域，恢复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肃清了以“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思想，从而大大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认识水平，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正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邓小平同志于 1979 年 8 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文中提出了社会学、政治学要赶快补课的指示。在小平同志亲切关怀下，社会学得到了正名，从此开始了社会学恢复的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主持召开了来自全国部分省市过去曾从事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专家学者的座谈会，向与会者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这

一重要指示。胡乔木同志代表党中央为社会学恢复了名誉。他指出,无论怎样讲,采用粗暴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宣布取消一门学科,禁止其存在和发展,这在政治上和科学上都是不对的。当时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同志也到会讲了话。在此期间,费孝通先生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委托,遵照中央委员胡乔木同志的指示,召开了在京的部分老社会学家的座谈会。与会同志听到了为社会学平反的消息,激动不已,也有人开始甚至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到会的老同志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在1957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冲击或伤害,风风雨雨几十年,所以当他们听到党中央重新肯定了社会学,此刻的心情十分复杂。为社会学正名,这同时也意味着为他们恢复了名誉,对他们过去所做的工作予以肯定。这确实是令人高兴和难忘的时刻。从此翻开了中国社会学发展史的新的一页,进入了中国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时期。

如果从1979年春算起,到现在整整过去了15个年头。在这15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许多方面都有了可喜的发展。这里不妨向刚刚涉足该领域的读者简单回顾一下对学科恢复和重建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件大事。

当时费孝通先生受命负责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筹备工作。首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社会学研究所,接着成立了中国社会学研究会,费孝通先生任会长,王康先生任总干事即秘书长。工作千头万绪,到底该从何处入手?显然,摆在第一位的问题是青黄不接,缺少搞社会学的人才。过去搞社会学的一辈已经年迈,力不从心,不能担当此任,而年轻的同志又没有,怎么办?只有自己动手培养。于是,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社会学研究会挑起了这副重担,开始了中青年社会学骨干的培训工作的。

1980年和1981年暑期,连续两年举办了两期社会学讲习班。社会学讲习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每期50余人,他们大都是一些热心社会学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其中以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居多。

这也恰好反映了中青年知识分子对于恢复这门学科的兴趣和热情。笔者也是这两期讲习班的积极参加者和热心的学员。

给学习班上课的教师，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而主讲人是以美籍华人杨庆堃先生为首的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几名社会学教授。此外，还有香港中文大学的几名高级讲师、社会学博士。他们为讲习班开出了一系列的课程，其中主要的有：“社会学概论”，“社会调查统计”，“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统计学”，“社区研究”，“社会学与现代化”，“文化人类学”，“高级统计学”等。中国老一代社会学家也分别讲授和介绍了解放前我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状况，以及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的心得体会。

每期讲习班的时间不算很长，一般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然而通过这样一段紧张集中的学习过后，大家普遍感到有很大的收获。培训过后的这百十来名学员就象一批种子把社会学的知识带到全国各地。他们当中的多数人早已成为社会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在该领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通过办讲习班，培养了重建社会学的急需人才。然而在十亿多人口的大国里，要使社会学能够在中国逐步得到普及不通过正规办学招收学生是不行的，而要办学就必须有教材。于是在1980年第一学期讲习班过后，费孝通先生就开始着手组织编写教材工作。从当时参加讲习班的北大、人大、南开、复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分校等单位，抽调了七、八个人，组织了一个《社会学概论》编写组。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几经修改和讨论，听取意见，最终于1982年写出了定稿。后又经费孝通先生修改和审定，交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5月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取名为《社会学概论》（试讲本）。这就是社会学恢复以后，同时也是我国解放以后中国人自己编写的第一本社会学教材。笔者作为编写组的一名成员，亲自参加和经历了这一过程。

在编写教材的同时，于1981年初，在南开大学哲学系举办了

社会学专修班。该班的 40 余名学员，经过一年的学习之后，有的回到原单位从事社会学教学，有的则留在南开大学转到社会学研究生班继续深造。在国家教委的大力支持下，后来陆续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一批重点大学办起了社会学系或专业。现在这些学校不仅招收本科生，而且招收硕士生、博士生，有的大学，如北京大学还设有博士后流动站。到目前为止，全国差不多有十七八、近二十来所高等院校设有社会学系或专业，由此可见社会学在我国 15 年来的迅速发展。

现在社会学不仅在大学里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国家和各省市级社会科学院系统也建立了自己的研究机构，成为社会科学大家族里的重要一员。

从 80 年代初期以来，各省市还建立了社会学学会组织，大量发展会员，为社会学的普及和提高作了许多工作。还应当指出的一点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单位发起并组织的社会学函授大学，在普及社会学知识、扩大社会学影响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辽宁省社会学学会也举办了类似的函授教育。一时间在全国许多地方掀起了一股学习社会学“热”。这也充分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深得人心，为社会人们所欢迎。

在社会学普及和提高方面，社会学的各种刊物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公开出版有《社会学研究》杂志，内部发行的有《国外社会学》杂志；北京市社会学学会公开出版的会刊是《社会学与社会调查》；辽宁出版有《中国社会问题》；上海出版有《社会》。至于内部通讯性质的社会学刊物也还有许多。

在此期间，出版了大量的社会学著作，其中以各种各样的教材为最多。除了社会学概论这类的书以外，有社会学史方面的，如中国社会学史，外国社会学史，社会学调查研究方法，社会统计